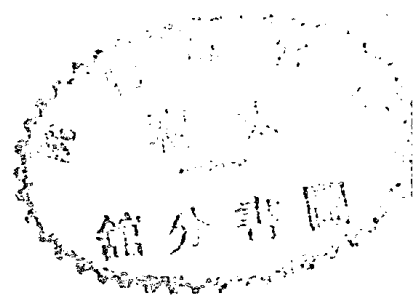


論中國之命運

艾思奇等著

曉明社出版



573.07
526
(578)/2

論中國之命運

A 2104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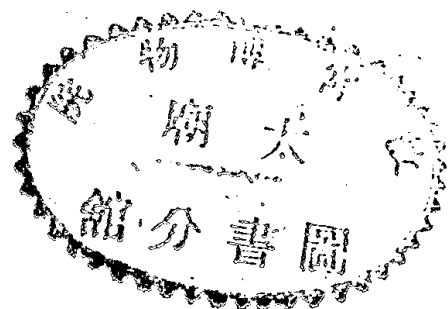
「中國之命運」——

極端唯心論的愚民哲學

艾思奇

以蔣介石先生的名義出版的「中國之命運」裏，論到了幾個哲學問題。這些問題，蔣先生是當作「革命建國的根本問題」來提出的，這就是說，蔣介石先生對這些問題的答覆，是全書裏所表白的「一套政治思想的方法基礎，這一套政治見解和哲學思想，是以「國父」主義的名義為標榜的，這就是說，作者自認爲是繼承了孫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但事實上是怎樣呢？事實上是很可惜，在「中國之命運」裏並沒有真正的三民主義和知難行易的思想，而只有關於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詞，以及在這些名詞裝飾下的中國式的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學，和反對科學唯物主義，提倡迷信盲從的，法西斯主義的唯心論哲學。

「中國之命運」裏的哲學思想，是一種極端不合理的唯心論。由於它的不合理，它和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裏任何一點進步因素都是絕緣的。從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上來看，孫中山先生的哲學思想，和科學的辯證法唯物論哲學是有很大距離的，它有着保守的唯心論的方面，但同時不能否認，它也有進步的唯物論方面。但在「中國之命運」裏，却完全拋棄了它的進步的



唯物論的方面，并用種種附加的引伸，擴大了它的保守的唯心論的方面，下面就要說明「中國之命運」裏有着怎樣一種極端不合理的唯心論，它是怎樣和中山先生「知難行易」思想中的進步因素「風馬牛不相及」。

(一)關於「誠」的思想。

在「國民今後努力之方向及建國工作之重點」一節裏，蔣介石先生開頭就引用了孫中山先生的一段話：「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而國事者一人羣心理之現象也。……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則反掌折枝之易，亦無收效之期也。……夫心也者，萬事之期源也。」從這一唯心論的說教裏，「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先生進一步引伸出自己的許多論點，因此我們不妨從這裏談起。

任何事情，任何主張計劃，只要「吾心信其可行」，就一定行得通嗎？拿事實來證明，恰恰就有無數相反的例子。秦始皇自以為皇位可以傳到萬世，因此自己叫做始皇，那信心可夠大了，但結果是二世就歸於滅亡。墨索里尼要在意大利實行法西斯主義一千年，信心雖比秦始皇小一點，但看來也似容易些，結果只維持了二十一年，還算一切法西斯國家中壽命最長的。納粹的軍隊，曾自稱是世界無敵的，的確有足夠的信心，但現在在蘇聯也算碰得頭破血流了。大後方的限價政策，在開始實行之前，據說是「成功之券，決可計日而至」的，但差不多一開始就失敗得一

塌糊塗了。據而言之，就是「中國之命運」裏所宣傳的一套反民主的政治主張，反「自由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企圖，以及遼遠渺茫的「實業計劃」的諾言等等，雖然說得津津有味，好像眼前差不多實現了的樣子，但實際上也必終歸是夢想。誰人不信，請看看將來的事實吧。

事實證明，信心並不能決定一切，同樣抱着信心去做的事，有的可以成功，有的必歸失敗。問題在於我們的主張和計劃的本身，在於信心的本身，有沒有可以成功的客觀條件。沒有一定的客觀條件，即是抱着天大的信心去做，也不過是唐吉訶德對風車的鬥爭，無結果的盲目冒險。什麼是那一定的客觀條件呢？一般的說，就是廣大民衆（尤其是工農勞動的人民）的物質生活發展的要求，就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的要求。合乎這些發展要求的事情，主張，計劃，加上人的主觀的努力，是可以成功的。違反了這些要求的行爲，無論主觀上如何有信心，終歸是要失敗的。

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並不否認「心」的重大作用，馬克思自己就說：「理論只要一掌握羣衆，就立刻成爲物質的力量。」一年多來，我們在整風中間，學到了一個規律：「一切問題要從思想上來解決。」我們不否認思想對於工作的重大意義，但首先的問題是：我們的思想必須是正確的思想，必須是合乎廣大民衆的物質生活發展要求的思想，必須合乎社會生產力發展要求的思想。這種思想在實質上本來就是民衆自己的思想，不過被領導機關，領導者集中起來，將民衆分散的無系統的思想，變爲集中的有系統的思想。因此再把這種思想宣傳出去，就能夠爲廣大民衆

樂意接受，通過他們的行動，發生偉大的實際力量，使工作能夠有很好的成效。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一種思想，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毛澤東同志的思想就是這樣一種思想。這種思想的正確性，爲中共二十二年來所實行的偉大革命事業所證明，爲抗戰以來的成果所證明，爲兩年以來實行三三制、生產運動、整頓三風、精兵簡政、統一領導、擁軍擁政愛民運動與審查幹部的成功所證明。所謂從思想上解決問題，並不是說任何思想都可以解決問題，而是要掌握正確的、合乎中國具體情況的、合乎中國廣大民衆的要求的、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思想，毛澤東的思想。這種思想之所以能夠有解決問題保證鬥爭勝利的力量，並不是單純由於思想本身的緣故，而是由於這種思想在中國社會上有堅強深厚的物質基礎，是中國實際鬥爭的反映。

△我們唯物論者，對於任何一種思想，必須根據廣大民衆的物質生活發展要求，來檢查它的好壞。有些不合實際的思想，雖曾被誇張爲「如日月經天樣明白」，但如果把它拿到地上的民衆的行動中間來攷驗，它就會失敗得一塌糊塗，如果一個人在他的政治主張裏給民衆提出了很多好聽的空洞的諾言與計劃，而在他的實際行動上却給民衆帶來了窮困災難，那麼，不管他的信心怎樣高，這種思想，這種主張和計劃之必然要破產，也正是一如日月經天樣明白的。

如果說「心爲萬衆之源」，在孫中山先生的思想裏，有時還有某些接近合理的因素——當他把這「心」解釋爲「萬衆的心」，解釋爲「人羣之需要」的時候，那裏面就有某些可以接近唯

物論的構構，那麼，經過了「中國之命運」的作者蔣介石先生的引伸，附加上中國舊封建時代的「誠」的思想，那合理的因素就是完全沒有了。蔣介石先生向「國民」要求說：「國民只須遵循主義，按照方略，順着成功的路線，窮理致知，實踐力行……所謂力行與致知，皆須出於至誠」，什麼是誠？乾脆地說，這裏之所謂誠也者，不外就是迷信的代名詞，廟宇的菩薩，都要向善男信女要求誠心誠意的去敬它，蔣介石先生說：「誠者成也」，「不誠無物」，又說：「不誠則天下無能成的事，至誠則天下無不成之事」。這是說，信仰可以決定一切，不管什麼思想，什麼主張，只要你誠心誠意，不問是非，硬幹下去，蔣先生都可以為你寫一張包票；「一定成功！」這樣一種見解的錯誤，這種包票之不可靠，只要根據前面所說的一切，就很容易明白。

唯心論的「不誠無物」，是完全不對的，在事實上，在唯物論者看來，第一個命題是「無物不誠」，第二個命題方可提出「不誠無物」任何精神、思想、志願、信心，如果沒有客觀物質基礎，就一切都是空談，因為物質是本源的，第一位的，精神「誠」，是派生的，第二位的。只有具備了充分物質基礎的精神「誠」，才有成功的希望。我們唯物論者的思想日程與工作日程是：一、「無物不誠」；必須使自己的一切思想意識都合於廣大民衆的政治經濟要求；二、「不誠無物」麼，將我們的正確的思想意識，堅持下去，絕不動搖，絕不灰心喪志，一定要達到民族解放與社會解放的完全成功。我們的唯物論哲學是與蔣介石先生的唯心論哲學完全相反的。

對於一切唯心論的東西，我們還可以提出和蔣介石先生完全相反的證明。「不誠有物」，「誠則無物」——對於法西斯主義就是這樣。法西斯主義者以「國家」「民族」的名義來欺騙青年，沒有經驗的青年們都高分誠地爲他們犧牲了，有什麼「物」可得呢？以德國的例子來說，成百萬成千萬的青年變成了炮灰，德國「民族」「國家」所得到的除了巨大的災難又有什麼？倘若德國的青年不受納粹黨的欺騙，對希特勒沒有那樣大的誠心，無數青年的生命又何至於變爲無物，德國民族的災難又何至於如此深重呢？這樣的在意義上說，「不誠」反而可以「有物」，問題的關鍵是在於：法西斯主義者自己的「誠」是沒有物質基礎的，是違背客觀要求的錯誤思想；法西斯的欺騙宣傳，本來是違背社會經濟發展潮流的，法西斯主義者的目的，只是要把極少數最大最大的地主資產階級養得更肥，而對於大多數民衆，對於國家民族，並不算真正貢獻任何一點東西，相反，只是下決心壓迫民衆，剝削民衆，他們口口聲聲講「至誠」，並不是他們自己真正有什麼爲國家爲民族的誠意，而只是爲着要求民衆和青年誠心誠意地像羊一樣地受他們愚弄，只是爲着要得到受騙者的「至誠」。對於這樣一些騙子表示誠意，自然要一切落空，在這種情形下，「誠則無物」是必然的。因此，站在廣大民衆的立場上，站在青年的前途和幸福立場上，對於任何人的任何一種思想主張，都要看一看它在實際上做的結果怎樣。而不要只聽他說得怎樣，我們的哲學首先是「無物不誠」，如果你對於國家民族的任何意見沒有科學的客觀物質條

件，對於廣大勞苦人民（他們是國家民族的真正代表者）以及青年（他們是國家民族將來的主人）的現狀與前途沒有真正「物」的貢獻，那我們就說：這證明你的所謂「誠意」是空的，是假的，是騙人的；而我們也就不能那麼便宜「對你拋出自己的」一片誠心了。

唯心論和宗教是相通的，「誠」字在中國的運用，本來就是一個迷信的符號，我們的許多寺廟裏，許多測字攤上，常常掛着「誠則靈」的招牌，求神問卦的人，必須恭恭敬敬，把紙燭貢品，和自己血汗換來的金錢送給和尚道士，以表自己的誠心，至於這樣表示之後，是福是禍，仍要靠你自己的運氣，和尚道士是管不着的，如果有禍只算你自己倒楣，不必問爲什麼，若一定要問爲什麼，那反而要給你加上一個罪名：「不誠」，在「誠則靈」的號召之下，實際的結果，只是要無數善男信女節衣縮食，把少數寄生的和尚道士養得更肥更胖，蔣介石先生也有塊「誠則靈」的招牌，其作用正和和尚道士的招牌一樣，不過是勒索貢品的幌子吧了。

法西斯主義者的唯心論的哲學，原來是一張空頭支票，它所以要對「國民」發出這張「誠」字號的空洞精神支票，就因爲它沒有任何物質的準備金付給廣大民衆，尤其是工農勞動人民，試就「中國之命運」裏對「國民」所允諾的「三民主義」來看，實際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就民族主義來說，誰不知道當前的大問題是日本帝國主義強盜還在我們的國土上橫行着，而蔣介石先生對這事却倒好像對「國民」滿不在乎，反而說：「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民權主

義來說，蔣介石先生沒有一個字提到要給全國人民以民主權利，却公然主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就民生主義來說，孫中山先生所常常關心的中國民生的最大問題：「耕者有其田」，以及大後方眼前迫切要解決的（或者說早就應該解決的）改善工農勞動人民生活的問題，蔣介石先生也一字不提，却長篇大論地侈談着三十年五十年以後的「實業計劃」，也不怕有人要問：眼前的死生問題尚且解決不了，三五十年後的遙遠計劃又有什麼途徑能夠實現呢？如果眼前的人民都餓死了，如果抗戰不幸失敗了，三五十年以後還有誰來建國，還來建誰的國呢？

蔣介石先生主張建國工作必須從心理建設開始，在他所舉的五個要目——心理建設，倫理建設，社會建設，政治建設，經濟建設——中，他認為（心理建設與倫理建設，實為各項建設的起點），而把政治與經濟建設放在程序的最後一步，這一個唯心史觀的顛倒程序的意義，就是要把物質的諾言推到渺茫的將來，同時又夢想用這空洞諾言來喚取國民今天的愚忠。「必須改變國民過去消極和被動的心理，與提高國民對國家和民族的道德。」這種說法，完全是似是而非的。如果所謂「國民」，是指全中國廣大的民眾（以工農佔最多數）而言，那麼，他們對於國家民族的心理，倒並不是那樣消極和被動的，他們的道德，比起少數達官巨富來，是高尚得不可比擬的，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國民的心理需要達官巨富們來改變，國民的道德需要達官巨富們來提高。現在的問題是貪官污吏腐敗政治和經濟剝削打擊了廣大民眾，壓抑了廣大民眾對國家民族的高尚道德。

的發揮，所以現在首先要解決的問題，恰恰不在於「心理建設」，「倫理建設」，而在於怎樣整頓貪污之風和那種官僚資本壟斷下的破產經濟和腐敗政治，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只有這樣來解決問題，民衆對和平建國的積極性才會發揮出來，人民對於國家民族的高尚道德才能充分表現出來。這並不是空論，而是事實。共產黨領導的陝甘寧邊區，及敵後各抗日根據地實現了真實的民選政治就是活的例子。

所以，從廣大人民的階級立場看來，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專制主義者以唯心觀點來責備「國民」的心理「消極」、「被動」，責備他們對國家和民族道德不夠，說需要「改變」、「提高」，完全是無的放矢。但就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制主義者的階級立場來說，提出這樣的問題來，是有其深刻用意的。從統治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看來，國家民族就是他們自己，不是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人民利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而是他們百分之二以下的人的利益代表國家民族利益。他們責備「國民」，是因為大多數人民爲他們少數利益的犧牲，擁護始終是消極和被動的，而不是因爲「國民」對抗戰建國事業被動和消極。他們所要提高的道德，乃是大多數人「誠心誠意」給少數人欺騙愚弄的道德。而不是因爲民衆真正缺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蔣介石先生關於心理建設的問題的提法，在事實上就只有這樣一個解釋，而蔣介石先生自己對於國家的政治經濟統治的實際情況，又證明的確只有這樣一個解釋。

總之，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之所以要宣傳唯心論的哲學，就因為他們需要把一切道理加以顛倒，而唯心論正符合了他們的這個需要。唯心論可以把白的看做黑的，好的看做壞的。不過爲要普遍宣傳唯心論，壓制唯物論，首先還得要一個物質基礎，就是用一切手段剝奪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在物質上壟斷了政權，在思想上也就壟斷了真理。仗着權力，把道理都霸佔到自己一方面，一個聲明，投敵叛國的軍官就被渲染成抗日英雄，一紙「軍令」，就可以把堅決抗戰的軍隊誣作「叛軍」。明明是腐敗政治摧毀了民衆的抗戰積極性，却說「國民」對國家民族的道德不夠高尚。嘴上「公」，實際上是借此爲私。嘴上說要「不知有私」，要打破個人利己主義，而反對的鋒芒却是向着真正公忠體國的抗日黨派和廣大民衆。「國家」「民族」是少數人壟斷的，所以「公」也是少數人壟斷的。不適合於這統治的少數達官巨富的利益的事，就被認爲「私」。這些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道理，我們領教得太多了，中國的人民，受蒙蔽也不會太久了。中國人民的思想，言論，出版自由也有了自已的一部份物質保障，這就是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存在。所以唯心論的壟斷，在中國境內已不能絕對橫行，若論唯心論的將來結果，那也只能是唯心的幻想吧了。

(二) 關於知與行的思想

「中國之命運」裏宣傳着反理性的唯心論哲學。在「誠」的名義下，蔣介石先生提高了信仰

和迷信，貶低了科學的客觀知識。蔣介石先生對於知識來源的見解，就是明顯的證明。依蔣介石先生的意見，知識不是來自客觀事物規律的反映，而是來自人類生來的本性。「知的本源在於人類的本性，不必外求。」「就表面說，我們求知，要接受民族的經驗和教訓，要學習外國的科學和技術。然而就實質上說，知識如果「無得於己」，便不能算是真知」。

何等荒謬，何等腐朽的唯心論！居然可以把民族鬥爭經驗教訓所證明的知識和科學技術知識都叫做「表面」的知識，而把人的所謂「本性」裏的一種莫明其妙的什麼東西（究竟是什麼東西，蔣介石先生沒有說清楚）當做所謂「真知」。在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竟來宣傳這種反科學的思想，除了法西斯主義的狂言囂語之外，是找不到它的任何比擬的，請看已經毀滅的法西斯老祖宗墨索里尼怎麼說：

「法西斯主義是宗教的概念，人們把握它不是用內在的知覺的報告的觀點，而是依據至高無上的信條的觀點，用客觀意志的觀點。它引導個人提高，使他自覺自己是精神界的一員。」

試問這裏所說的一切，和「中國之命運」裏的見解有什麼本質上的分別？法西斯主義的知識論，就是要破壞科學的合理的知識，對人民灌輸一種神祕的宗教信仰。漢奸周佛海還未公開投敵的時候說：「相信主義要做到迷信的程度，服從領袖要做到盲從的程度。」「中國之命運」裏所謂出自「人類的本性」的「真知」，除了把它看做這種盲目的信仰與盲目的服從之外，是找不到

別的解釋的；因爲它把經驗的科學的知識都降低到「表面」知識的地位。試問世界上除了實際經驗所證明的知識，除了科學知識之外，還有什麼真正合理的知識？輕視這種知識，就是輕視理性，反對真理。所以，「中國之命運」裏所說的「真知」，實際上是等於「無知」；而蔣介石先生生在「真知」的名義下向「中國人民」要求的，只是糊裏糊塗的盲目信仰與盲目服從，渾渾噩噩的跟着腐朽到頂點的天地主大資產階級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藉以維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一黨專政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統治，中國境內蔣介石輩一切反動唯心論宣傳，其真正的目的全在於此。

舉例來說，蔣介石先生對於有些革命先烈的英勇犧牲精神所給予的讚揚和解釋，就包含着這樣的意義：

「爲什麼清末民初革命的先烈，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呢？他們篤信只有革命纔可以救國救民，他們就力行革命工作，死生榮辱，置於度外。他們的「知」本於天性，他們的「行」發於真知，纔造成推翻三千多年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的偉大事業。」

這裏包含着以下的見解：第一，所謂「本於天性」的「真知」，就不外是「篤信」。第二，革命先烈之所以能赴湯蹈火，視死如歸，就是由於有了這種「真知」。第三，只憑着這種「真知」，就能夠完成偉大的事業，這些見解，是對於革命先烈的犧牲精神作片面的讚揚，而對

於他們的思想和事業，不給與任何忠實的客觀的估計。不錯，對於每一個時代的真正革命者的英勇犧牲精神，我們是應該讚揚，應該學習的。但作爲一個現在的革命者的我們，作爲歷史上一切革命事業的真正繼承者的我們，對以往的革命者首先應該關心和研究的，是他們的具體的思想和事業，是他們的正確和錯誤，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教訓。先烈們的犧牲精神是一回事，他們對革命的認識是否能達到了絕對的「真知」，又是一回事。除非人類的思想永遠不會進步，否則我們就要忠實的承認，過去的革命者，由於時代的限制，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是有限制的。尤其是在馬克思主義以前的革命者，由於沒有完全的科學方法，只憑形式邏輯或經驗主義看問題，他們對於革命的認識是常常不夠或錯誤的。以孫中山先生自己的例子來說，在國民黨改組時他就承認過去革命方法的不對，如果說他的「知難」學說有進步意義，那意義就在這裏。真正有革命良心的人，應該學習孫中山先生的榜樣。所以，對革命事業能夠「篤信」，並不等於所「篤信」的就全是「真知」，而能夠篤信，能夠「赴湯蹈火，視死如歸」，也並不能保證事業一定成功；要保證事業成功，不是空洞的「篤信」可以奏效的，第一要有正確，完全的認識作爲指南；第二，在這正確完全的認識上建立我們堅強的信心，或所謂「篤信」，這就是說，我們的信心或「篤信」是和正確、完全的認識一致的，是分不開的；第三必須要有羣衆的力量——物質的力量作基礎，必須通過羣衆的革命鬥爭去推行我們的事業，才能保證成功——這些就是我們唯物論者的了解。辛亥革

命推翻了三千多年的君主政體，與二百多年滿清專制，這自然是一大成績。但民主革命並沒有成功，中國的半殖民地制度與半封建制度並沒被推翻。這一方面固然也由於客觀條件的限制，另一方面也由於先烈們對革命的認識不夠，而這認識不夠是包括當時孫中山先生自己在內的。中山先生始終以爲辛亥革命已經是「破壞的革命」的成功，而沒有看到，就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來說，辛亥革命的破壞革命的破壞是根本沒有成功的，這一個不正確的認識，不正是使中山先生的活動始終束縛在軍人政客圈子裏，不能與真正革命的羣衆相結合，而一直到十三年國民黨改組以前，總是在自己陣營裏碰釘子的原因嗎？

把「篤信」當做「真知」，用信仰代替知識，以先烈的犧牲精神作爲神聖的崇拜的偶像，不學習他們成功與失敗的經驗教訓。這不是尊重先烈，而是想利用先烈白骨，來驅取青年的熱血和頭顱，好使青年們跟着買辦封建性的法西斯主義者去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冒險，藉以維持國人皆曰可廢，天下人皆曰可廢的中國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腐敗統治，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這裏已轉到了行的問題：蔣介石先生對「行」是非常看重的，蔣介石先生自己並認爲是在倡導着「力行哲學」，有時甚至於把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省去一半，簡單地稱做「國父的（行易）哲學」，甚麼是「行」？如果只滿足於字面上的解釋，那麼，蔣介石先生的答覆自然也是「革命工作」的「行」。但就實際上看，蔣介石先生所謂的「力行」，和真正的革命的實踐，

是根本不同的。第一，蔣介石先生所要求的「力行」，如前面說過的，是憑藉「誠」，憑藉着所謂出於「本性」的「真知」，憑藉着對於「主義」，對於「領袖」，對於先烈，對於「國父」的偶像化的信仰，那就是宗教式的崇拜行爲，這是反動的行爲，而不是真正革命的行爲，真正革命的行爲，必須有科學的客觀規律知識爲指導，必須具體而深刻地了解周圍的實際情況，必須正確地認識民衆，尤其是工農勞苦民衆的希望和要求，必須和廣大人民在一起，依照着地上的現實的人民所要求的方向，而不是依照着任何偶像化了的個別人物的要求和他們所謂「如日月經天一樣」的什麼「主義」去行動。其次，與上面相關聯，蔣介石先生所要求的「力行」，是盲從的行爲，是要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是想把封建時代愚民政策的統治施行到今天，所不同的，是曲解和利用了「科學方法」的名義。蔣介石先生說：「依照科學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必遵循分工專職的原理，知者與行者雖有合作的必要，然仍須分工。」這就是說，知者不一定要力行，而行者也不必要有知，這也叫做科學方法嗎？真是冤枉了科學方法！實際上正是按照科學方法，每一個人的工作雖然有分工專職，而每一個人對於他自己所專的一部份職務，必須具有正確的完全的知識，同時對於整個工作也要具有一般的正確知識，否則就無從完滿地擔負起自己的分工專職。真正的革命工作，也決不能讓一些無知無識的人，例如達官巨富們來幹，革命工作裏領導者與被領導者固然是一種分工，然而這種分工決不是知者與不知者的分工，領導者指示總的鬥爭方向，

被領導者也必須善於領會這個方向，並把它正確地應用到自己所處的具體情況裏。在這一方面說，被領導者的「知」，常常比領導者還需要更加具體，否則是不能完成任務的。再次，蔣介石先生所要求於「國民」的「力行」，不是破壞舊社會建立新世界真正進步革命的行為，而是保守舊社會，遵循既有秩序的行為，這只要看蔣介石先生反覆稱讚孔子的「六藝教育」，「要學者從六藝的實行得到真知」，要學習孔子一流的「禮，樂，射，御，書，數」，就可以明白。在革命的時代來宣傳孔子一流的「六藝教育」，要國民學習封建時代統治者所崇尚的行為，試問這有一絲一毫的革命氣味沒有呢？

總而言之，「中國之命運」的哲學是愚民哲學，在「真知」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無知，在「力行」的名義下要求人民盲從，我們應反對這種欺騙人民的極端有害的哲學，我們應該揭破它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買辦性的法西斯主義的真面目！

「三」關於孫中山的「知難行易」思想

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和蔣介石先生的所謂「力行哲學」，是有根本不同之點的。「力行哲學」是反革命的反理性的愚民哲學，而中山先生的思想則有進步的方面，有合乎科學和理性的方面，在某一方面說，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思想是反映着中國革命過程中的一些真實情況的。

中國革命，由於它的特殊條件，經過了一個複雜的、長期的過程，這種客觀過程，反映在人的認識上，反映在中國革命者對於革命規律知識的掌握上，也就表現為一個長期的摸索和試驗的過程。爲着這摸索和試驗，中華民族付出了它的千萬優秀兒女的頭顱和鮮血，毛澤東同志說：「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這是中國革命認識上的最真實的情形。

中國的革命，是在帝國主義國家侵略刺激之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的被侵略，是由於中國本身的落後。封建社會的萬里長城，抵擋不了資本主義的洋槍大砲，舊封建社會統治者的思想文化，不僅便利於滿清的異族統治，更便利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支配。爲着挽救中國的危亡，中國必須進步，中國革命中的志士仁人必須從先進國家學取進步的革命思想學說，並善於應用之於自己國家的具體情況中。因此，在認識過程上，一方面要依據自己民族的鬥爭經驗和具體國情的認識，另一方面又要吸收先進國家的革命思想學說；這就表現爲外國的先進革命理論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過程。從太平天國採用基督教的「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起，到五四以後，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爲止，思想上的摸索過程，和革命的發展過程，是互相照應的。

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一個最好的真

理，作爲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爲之一新。」（毛澤東）

這一個思想上的摸索過程，也曾是長期的，艱難的，但這種艱難現在已經過去了，我們已經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旗幟下，找到新民主主義的道路了。雖然在找到這條道路以前，中國民族曾經過了不知多少的失敗和痛苦。

孫中山先生親身經歷了這艱難苦痛的過程。他比他以前和同時的革命者都偉大的地方，就在於能夠自覺到摸索的艱難，因此也就能夠不斷地向前進步，能夠「以俄爲師」，探求新的革命方法，拋棄舊的方法，不停止在固定的一點。他在實際行動中，幾次和與資產階級革命隊伍中的妥協保守的傾向鬥爭「辛亥以前反對立憲派，辛亥以後反對和袁世凱北洋軍閥妥協，十三年改組國民黨又反對西山會議派」。在思想上，能夠和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已經腐朽已經過時的公式作鬥爭，在屢次試驗失敗之後，在共產國際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之下，毅然採取了新三民主義即新民主主義的方法。

中山先生之提出「知難」的思想，是表明他能夠自覺地認識到把握中國革命規律知識之艱難。就在這一點上，他的思想是有着進步的唯物論的因素的，是合乎中國的客觀實際，合乎科學和理性的。就在這一點上，有着孫中山先生對於新事物新知識的不斷追求嚮往的精神。有着在行

動上不妥協不灰心喪氣的堅毅的精神，這是他以前和同時的一切中國資產階級革命家都不能相比的。

孫中山先生說：「吾人之在世界，其智識要隨事物之增加，而同時進步，否則漸即於老朽頹唐；靈明升綱，是以智之反面則爲蠢，爲愚，」。「軍人精神教育」。這是一種素樸的唯物論思想，這種思想說明人的「智識」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不是如蔣介石先生所說，出之什麼神祕的「人的本性」。這種思想，說明人類的認識要跟着事物的發展而不斷發展，不能停止於任何一個舊的立腳點。「孫文學說」關於「十十的論證裏，也流露着這一種發展的思想。這是中山先生的思想精華，是使中山先生能夠在政治上從舊三民主義走向新三民主義的方法基礎。既然蔣介石先生口口聲聲說要「遵奉國父遺教，繼承遺志」，那就要首先懂得這一個最重要的遺教和遺志。否則就是口頭上的信徒，實際上的叛逆！

這是「知難行易」學說裏的進步精神。但我們應該看到，這一個「學說」，是五四運動以前中山先生對於自己革命鬥爭經驗的總結。在時代上，他是中國的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思想的一個構成部分，他本身基本上沒有超出舊資產階級啓蒙哲學的範圍。他具備着啓蒙哲學的進步方面，即就是對於世界的一般的唯物論的理解，對於科學的客觀的合理知識的重視。但他同時也有啓蒙哲學的弱點，那就是對於社會和革命的認識，不能貫徹唯物論的觀點，而依然是唯心論觀點。

中山先生不能從物質的經濟的基礎上去看社會的變化，不能依據社會階級關係的分析來解決中國革命的問題。因此，他對於自己的革命經驗的總結是錯誤的。第一，說辛亥革命在破壞方面已經成功，却不知道，辛亥以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經濟基礎既然根本沒有推翻，所以革命對舊社會的破壞，也並沒有成功。第二，說辛亥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其原因單純的在於人的「心」中，單純地在於「知」與「不知」之故。「却不知道，辛亥以後革命之所以仍然不成功的基本原因，是由於沒有找到堅強的革命階級作爲基本的動力，是由於革命營壘的活動依靠了一些反動階級的軍人政客和這些傢伙之背叛革命，是由於沒有找到反映廣大人民要求的反帝反封建的明確的革命綱領，是由於舊民主主義的方法與綱領已經過時，已經無力，並不是由於人們「不知」這一套舊方法舊綱領。這一點，在一九二四至二七年的大革命中完全證明了。

知難的思想也有消極的一面，過分誇大這困難，於是得出結論，認爲廣大羣衆與知識無緣，只有少數貴族能獲得正確知識。其實，本質地說來，正是與此相反。孫中山先生摸索到中國革命「必須喚起民衆」的道路確是很困難的，甚至直到國民黨改組以後孫先生也還是常常動搖，這正是係先生本人在歷史上長久地自居先知先覺，而視民衆爲不知不覺，與他們自覺地相脫離相隔絕的緣故，中國的廣大農民，不但在知道中國需要土地革命，需要民主政權，需要抗日戰爭的問題上，並沒有像許多大人先生們所經歷的那樣困難，即在學會分田查田，學會自己辦事，學會放槍

打游擊的問題上，也沒有像許多大人先生所斷定的那樣困難。應該公平地說，只有羣衆才是真正
的先知先覺者，聯系羣衆的領導者，集中了羣衆的經驗，在這一點上說來，實在是後知後覺者，
而脫離羣衆的所謂領導者，則是不折不扣的不知不覺者。孫先生在這一方面，錯誤見解，就是把
領導者看成脫離羣衆的天生的聖賢才智，而把羣衆看成盲目無知、平庸愚劣，只能閉着眼睛跟領
導者走的「阿斗」，因為這一些基本觀點的錯誤，就產生了孫先生所謂的「真平等」、「假平等」、
「權能分開」、「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等一連串的錯誤觀點，三民主義所以能被法西斯主義者和
漢奸汪精衛輩所利用，這正是主要原因之一。孫中山先生不知道這樣的唯物辯證法：革命領導者
是羣衆的學生，又是他們的先生。領導者只有從人民學習，才能體會人民的思想、感情、要求，
這就是給人民當學生，領導者將人民的分散的、無系統的思想、感情、要求總合起來，化爲集中
的有系統的理論、綱領、方針、政策、辦法，再拿此去向人民作宣傳，並使之見於行動，這就是
向人民當先生，孫中山先生強調當先生的一面，不知當學生的一面，所以變成了唯心論的見解。

「知難行易」學說的這一弱點，就使孫中山先生對於知行問題解決得不正確。知首先是行的
反映，其次是行的指導，同時又須受行的考驗，這是孫先生所不曾了解的，孫先生把感性的知與
理性的知混爲一談，又不知道感性的知正是理性的知之基礎，於是把知與行完全對立、完全隔離
起來，講了一大堆「不知亦能行」、「能知必能行」等不符合於事實的玄學，孫先生這種二元論的

和唯心論的解釋，不僅使後來蔣介石先生的法西斯化的愚民哲學得到了一個根據，並且使一切食言而肥的諾言專家們得到了一個護符。

這些就是孫中山先生的知難行易學說的弱點，這些弱點，當中山先生與共產黨人合作，並且採取了革命行動的新方法以後，是在許多具體的問題上都克服了，例如在改組國民黨的時候中山先生檢討過去的失敗經驗，已不再認為是革命黨人「不知」的緣故，而是依照了「俄國有個革命同志」的說法，認為是國民黨內有反革命份子「能乘隙以入」，「卒至破壞革命事業」的緣故，又在他臨終不久以前的「喚起民衆」的主張，以及希望「在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則是把劃分建國爲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的「阿斗」主義的思想取消了。

蔣介石先生的「中國之命運」裏，完全抹煞了中山先生思想上的這一個進步，盡量利用和擴大了他的舊的弱點，這樣，藉着中山先生「行易」哲學的名義，來製作一套極不合理的唯心論的，鼓勵盲從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中國式法西斯主義的愚民哲學。

只有當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論和歷史唯物論應用到中國來之後，中山先生的舊民主主義啓蒙哲學對中國社會中國革命的認識上的唯心論的弱點，才完全克服了，根據歷史唯物論的科學方法，中國共產黨指出革命不成功的原因是由於與帝國主義相結合的封建制度仍然存在，因此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推翻中國封建剝削制度的主張綱領。中山

先生領導下改組後的國民黨也接受了這綱領，使中山先生所三民主義充實了新的內容，又根據中國革命所處的時代條件，中國共產黨指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不能成爲單獨領導中國民主革命的堅強的力量，要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必須首先依靠工農小資產階級羣衆的力量，尤其是依靠工人階級和他的政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山先生接受了這一個思想的某些要點，在改組國民黨後規定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使中國的民主革命，使三民主義的實現，獲得了真正堅強有力的基礎。

中國共產黨人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這結合的過程，是根據了中國社會的具體情況，和中國工農羣衆廣大人民的鬥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和廣大人民在一起，發動人民積極鬥爭的精神，並以「甘當小學生」的態度，從羣衆中學取領導革命的知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的知識，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領導者決不以唯心主義的「先知先覺」自居，決不把人民簡單地看做不知不覺的「阿斗」，相反地，共產黨人知道廣大人民羣衆的偉大的積極性與創造力，只有他們，只有人民才是一切革命的真正主人翁，同時共產黨人又知道，人民由於長期處在反動統治下面，造成了文化落後，而人民的意見與力量又是分散的不集中的，所以人民迫切需要自己的政黨，自己的領袖，自己的先鋒隊這種政黨先鋒隊不是高踞人民之上，而是處在人民之中，與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向人民學習，又教育人民，這樣的政黨，領袖，先鋒

隊，就是中國共產黨，因此，只有中國共產黨才能掌握真正適合中國國情的理論知識，才能自誕生以來領導中國人民連續不斷地進行了三次驚天動地的革命事業，才能堅持抗戰到今天，並在各根據地建立了真正新的三民主義的中國。

這一切事實和思想，都和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的名字分不開，到了今天，鐵的事實已經證明，只有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實際情況發展了和具體化了的辯證法唯物論，才是能夠把「中國之命運」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學的哲學，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學。

誰革命？革誰的命？

范文瀾

蔣介石先生作了一部「中國之命運」，聞已通令全國各黨政軍民學校機關誦讀並提出批評意見，我們頗有所感，未敢緘默，略述所見：

一 應該學些革命建國的基本知識

「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那是最危險不過的事情，企圖「決定」中國的命運，首先應該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新民主主義論」，至少應該從「新民主主義論」中學得幾條基本原理，才不至鬧太大的亂子，如果有人自以爲是，目空一切，幻想對中國的命運也來一下「獨裁」，那末準備自己連人帶馬滾到深池裏去。

從「新民主主義論」中至少該學些什麼基本原理呢？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已經進入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滿清政府不懂得這個道理，誓死反抗潮流，保持封建專制，結果被主張民權共和的同盟會打倒了。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

戰及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以後，中國已經進入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中國革命成爲世界革命的一部份」，堅持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專政的國民黨，怕懂得或存心忘記這個道理，誓死反抗潮流，積極輸入「舶來品」法西斯主義，與所謂「固有文化」的封建專制主義化合而成新專制主義，結果大背國情，民怨沸騰，暴日乘機侵入，造成中華民族空前的危機。

國民黨反動派聽着；睜着眼睛看什麼是革命的對象呀！

中國無產階級、農民階級、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乃是決定國家命運的基本勢力，他們也要成爲中華民主共和國的國家構成的基本部份。現在所要建立的中華民主共和國，只能是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們聯合專政的民主共和國，這就是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就是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義共和國。

國民黨反動派聽着；決定中國命運的廣大人民是要建立這樣的一個民主共和國呀！

蔣介石先生既說要決定中國的命運，而且也知道「破壞國家就是破壞你本身以及你世代子孫永久的生命，這個關係太大了」，那麼就請實踐「忠言逆耳良藥苦口」的格言，平心靜氣讀一讀「新民主主義論」，免得著作一部禍國殃民，最後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的「中國之命運」。這一部聖諭廣訓，說來千言萬語，畫龍點睛處正在反對人民的內戰。

二、國民黨的革命性

中國廣大的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與其他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基本勢力，而工人農民又是基本勢力的骨幹，沒有他們就沒有革命，也就沒有中國，所謂「中國的命運完全寄託於中國國民黨」，所謂「沒有中國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真有那麼一回事麼？誰都知道政黨只有領導的作用，它所領導的階級及其聯繫的羣衆，才是真實力量的所在。試看國民黨代表了那些階級和羣衆？

國民黨是中國資產階級的政黨，其中佔絕對統治地位的是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它的廣大「可靠的羣衆是軍閥、官僚、政客、土霸、劣紳、文丐、投機商人、托匪、特務、漢奸、法西斯份子、落後的受欺騙的教員和學生等等」，一部份進步的有正義感的黨員被壓迫、歧視，甚至被監視，造成黨內的窩公宅，只在一定時期中與一定程度上有些革命性，而妥協性與反革命性却有了極大的比重，三四年前，大資產階級的一部份，以汪逆精衛爲代表，率領一批黨國要人及「廣大」羣衆投奔日寇，在南京開張換日，翻印了一個「國民黨」、一個「國民政府」、一個「領袖」之謬論，克盡「剿共」的「天職」。恰恰相反，有了這種反共發展到叛國的「國民黨」，「那就沒有了中國」，因之，有了從反共發展到內戰的國民黨，其去「沒有了中國」也就不遠，足見反

共是亡國的道路，理極明顯，現在還在抗戰的國民黨，在反共反人民一點上，也同樣克盡「天職」，積極進行全黨特務化的工作，特務漢奸與汪記「國民黨」交流合作，情同一家。最近漢奸吳開先乘飛機逃歸祖國大受歡迎，漢奸陶希聖著書立說，儼成思想界的泰斗，漢奸龐炳勳、孫殿英等三十三個高級將領前後率部投敵不受懲處，七月二十三日中央社還宣傳龐司令被俘前數分鐘慷慨告部屬說：「要以國家民族爲重，應本以往精神繼續奮鬥」，以降敵反共爲繼續奮鬥，太丟國家民族的臉了。這些事實已使全國人民感到國民黨敵我混淆，面目模糊，形跡是可爲疑。在最近中央社公開廣播「解散共產黨」，「取消邊區」的反動要求下，撤退河防軍隊，並以精銳十六師，企圖閃擊邊區，完成「統一」計劃，全國人民驚駭呼號，憤怒切齒，絕對反對亡國滅種並違背民意的反共內戰，按照「國民不包括反革命份子，不包括漢奸」的原則，以國民爲號召，國民黨似乎有褻奪名義的必要。

孫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是值得欽佩的，他的三民主義曾經三變，有同盟會時代以排滿爲主題的三民主義，有中華革命黨時代收起民族主義的二民主義，有國民黨改組至大革命時代接受共產黨提出的反帝反封建兩大基本任務、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而重新解釋的三民主義。中國共產黨認爲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上，共產黨政綱與三民主義基本上有相同的部份，就指的這個真正革命的三大政綱的新三民主義。自從一九二七年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背叛大革命以來，新三

民主義久已高高掛起無人問津，汪逆精衛於是另製賣國三民主義替日寇服務，而新專制主義的三民主義，則藉暴力推行於國內，蔣介石先生竟敢借三民主義之名，公然講出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那樣謊謬的鬼話來侮辱人民。保皇黨巨魁梁啟超還知道改裝門面，來一套「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新花樣。這裏自稱「三民主義」却提倡愚民政策，肆無忌憚，其思想比梁啟超更倒退一個歷史時代。要把這種變質冒牌的三民主義作爲「國家的靈魂」，實在是對國家大不敬，幸而中國廣大革命民衆並無如此罪惡的「靈魂」，因之還能保存國格，堅持抗戰，列在四大強國之一。如果「外國人譏笑我們是落後國家，是劣等民族」，應由「我們」變質冒牌的三民主義去承受這種侮辱。

在如此國民黨，如此三民主義的統治之下，軍事則練兵，宗旨側重反共，所謂軍紀軍令不施於降將叛軍，却亂施於忠勇抗日的八路軍新四軍；黨務則收羅大批特務漢奸，當作黨的靈魂，陰風慘慘，專以破壞革命屠殺青年爲能事；政治則貪風大熾，敲骨剝皮，人民逃亡無路，民變到處發生；經濟則農村普遍破產，百業凋敝，全國經濟命脈壟斷在十數金融巨頭之手；教育則戕賊青年，威脅利誘強迫接受特務訓練，漢奸思想，充當反共的鷹犬。這樣做下去中國能否永久存在已成疑問，何顏吹噓「三民主義與國民革命的成績，亦已經昭著於國民的面前」；更何顏吹噓「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裏面的新血輪」。如果國民黨不放棄反共的宗

曾，不改變「革命等於反共」的謬見，即是黨和團擴張到異常大，無非增編幾千幾萬個特務大隊，禍國殃民，造更大罪孽。中國何辜，人民何罪，要供養這一羣反動螻蟲來加深自己的災害？「權利」「義務」那一套話的本意，就在勸人反共，真正國民是拒絕這種所謂「權利」「義務」的，只有喪失國民資格的「國民」，才會享反共的「權利」，盡反共的「義務」。

現在事情很顯然，團結、民主是革命，反共內戰、專制獨裁是反革命，衡量國民黨的革命性究有多少，只要看它做出來的是些什麼事情。

三 誰是真正革命建國者

中國革命建國的基本勢力，也就是決定中國命運的基本勢力，決不依靠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及其豢養的鷹犬們，而是依靠工人、農民以及小資產階級。抗戰六週年來，已經極明確的證明了這個真理，而中國共產黨正是領導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來完成革命建國，決定中國命運的偉大政黨。

中國共產黨一次又一次的從危境中挽救中國，並昭示全國團結救亡，引導了民族抗戰的先聲，中國統治者有其一貫的歷史傳統，故意造成離心離德「一盤散沙」的局面，以便從中操縱，即大呼「一個黨」的國民黨本身，也不過是幾十個幾百個黨的一個聯合形式而已。中國共產黨發

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忍耐組織全國人民，在抗戰中建設新中國的實例，試舉幾件人所共知的大事，足夠證明中國共產黨在領導抗戰建國的事業上，起了什麼作用和處在什麼地位。九一八事變以後「攘外必先安內」，國民黨正喊得起勁，正「安」得格外起勁，中國共產黨發表「八一宣言」，呼籲國內各民族、各階級、各黨派在抗日旗幟之下，確立了抗日必勝的基礎，西安事變突然發生，汪精衛勾結親日派準備出賣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當機立斷，力主和平解決，釋放蔣介石先生，因而粉碎了賣國陰謀，結束了十年內戰，劃平了抗戰的道路。七七以後，中日間正式進行大戰，全國朝野缺乏理論的指導，議論龐雜，信心動搖，甚至有人留戀漢奸的誘惑，不能忘情於妥協的死路，中國共產黨領袖毛澤東同志及時發表「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名著，並隨時發表拯危反頹的重要論文，指示了抗戰的正確路程，建國的具體方針，使淪陷區與非淪陷區人民認識中國命運的歸宿地，勇氣百倍的向遠大目標邁進，國民黨頑固反動派掀起皖南事變企圖變解放戰爭爲亡國內戰，中國共產黨揭破反動黑幕恰當處理事變，使抗日戰爭仍然繼續進行。抗戰初期國民黨將領棄地覆軍，節節敗退，廣大領土相繼淪陷，日寇進攻勢如破竹，腹地都市岌岌可危，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獨能深入敵後收復失地建立許多抗日民主根據地，牽制在華敵軍一半，對抗僞軍全部，從此日寇後顧有憂，不敢長驅前進，至今袞袞諸公得安居重慶，西安，侈奢極慾，腰纏累累可謂得意極矣！過河未半，即動手拆橋，人之無

良，一至於此！中國共產黨與廣大民眾密切結合，自力更生，在各根據地一面抗擊敵僞，一面積極進行新民主主義建設，三三制的民主政治，豐衣足食的經濟發展，思想自由的文化培養，雖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無不欣欣向榮，一齊前進。新中國的基礎確已奠定，試與大後方政治腐敗，經濟凋敝，文化衰落，軍無戰意，民不聊生諸現象對照，老朽的舊中國與發展的新中國儼成兩幅不同的圖畫，從此可知，革命建國的基本勢力不是工農和小資產階級麼？領導革命建國成爲人民救星的不是中國共產黨麼？抗日與民主，革命與建國是一件事的兩面，不是顛撲不破的真理麼？

只有不敢正視客觀現實的人，才敢閉門自造兩套計劃：一套叫做以反共爲中心的「革命」計劃，一套叫做以僞碗爲香餌的「建國計劃」，誰都知道反共反民主國將不國還有什麼建？即使有所謂「國」者存在，仍不外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而所謂建也無非建一個汪逆精衛式的奴化國或一個百年來老牌的半奴化國，那時候自然會有太上皇製出榨取計劃來，十年實業計劃，「命定」了京置高閣。所以事情很顯然，只有共產黨已經實踐的團結，民主建設，才是革命建國的正確道路，也只有共產黨才是領導真正革命建國的偉大政黨，企圖以反共反人民當作革命，以空談當作建國野心家，當心被人民拋棄，變爲向隅而泣的可憐蟲。

四 請問究竟想革誰的命

抗戰已進入第七年了，竟還有人不認識革命的對象，拿着屠刀想革命，革人民之命，其理由是：「中國從前的命運在外交就是操在外國的帝國主義之手；而今後的命運則全在內政，就是操在我們全國民民自己的掌上」。這裏所謂「今後」，當然指本年一月十一日（中英中美訂新約日）以後而言，如此說來一月十一日以前操持中國命運的是一般帝國主義，把近年來英美對華的友好援助與日寇的暴力侵略等量齊觀，毫無區別，甚至借中英中美簽訂新約作口實，宣傳中國已得完全解放，似乎日寇侵略中國大部份領土連同「從前」淞滬停戰協定，何梅協定，塘沽協定等等賣國「外交」，一律在英美外交賬上，隨新約的簽訂一筆勾銷，從此中國外交大勝利，萬事大吉祥，可以「全在內政」了。我們曾學習過「特別字典」，「革命」的意義就是反共，「內政」就是反共內戰，「從前」中國還有「外交」的束縛，所以「安內」不夠淋漓痛快，「今後」中國完全獨立自由，「內政」大有可為，特哉，特哉，機不可失。「操在全國國民的掌上」，這是騙人的話，其實是說操在中國獨裁者蔣介石的掌上。

從這個荒謬思想出發，產生另一個荒謬思想，就是：「中國命運其決定即在此抗戰時期，而不出於這二年之中」，這等於對中國人民、中國共產黨公開宣戰，說在這「二年」抗戰時期內，企圖發動反共反人民的內戰。

這也算是先禮後兵，「政治家」的「寬大」態度吧！指桑罵槐的大叫，「那還能算是一個中

國的國民」，更如何說得上是「政黨」，世界上那一個國家的政黨，有從事武力提倡割據的方式，來妨礙他本國的國家統一而阻礙了政治，這樣還不是反革命？還不是革命的障礙？這樣革命的障礙如果不自動的放棄和撤銷，怎樣能不禍國殃民？不只是禍國殃民，而且最後結果非至「害人自害不可」，……「那就找不出有什麼合理的解決方法了。」「罵」得好痛快，大概肝血衝昏大腦了吧，其實指罵的那個「政黨」，何必老遠到「世界上」去找呢？只要不是數典「忘祖」，甚至連本人歷史也忘了的話，同盟會推翻滿清，國民黨反對北洋軍閥，不就是這樣的政黨麼？這一大串訓斥，好像重返西太后、宣統皇上、袁大總統、段總理、吳上將軍之流的「盛世」，恭讀解散國民黨討伐孫中山的嚴諭；又好像奇居在「王道樂土」，滿口咀咒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的咆哮。滿清政府、北洋軍閥、日寇汪逆都曾說找不出什麼合理解決的方法了。甘心在反革命的死路上拚扎拚命，結果呢？失敗滅亡！

中國共產黨是領導中國人民爭取民族獨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偉大政黨，他和人民大眾是血肉一體的，他和中華民族是利害一致的，他不怕任何反革命的威脅，也不怕任何反革命的譴議，如果有人拿出所謂「合理方法」以外的「方法」來，人民就會把他踢得粉碎；如果拿出一「封建割據」，「變相軍閥」，「障礙革命」，「破壞統一」，「妨礙建設」等等缺乏政治常識的謬言來，人民就會噴之以鼻。

請問國民黨反動派到底想革誰的命？想革中國人民的命，想革中華民族之命。如果不是，爲什麼成心撥動內戰，難道中國全部淪陷才快意麼？難道十年內戰還不夠慘苦麼？

五 幾個忠告

組織一個龐大無比的特務黨，幻想在全國實行一個新專制主義，發動內戰，二年中「消滅」共產黨及一切進步的勢力和地區，這種「朕即國家」的荒謬思想應該放棄，因爲現在是反法西斯主義戰爭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時代了。

「軍政時期不能終結」，「憲政無法開始，訓政亦無從推行」，這一類反革命話頭應該收起，因爲人民早已拜讀過「五五憲法」，也親灸過保甲訓政，並不再存些什麼幻想了，軍政還是「終結」爲好，人民厭苦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豈不應了「佳兵不祥」的定論麼？

「……須知這並不是中國國民黨有什麼特殊的力量，而乃是時代與歷史的使命所造成的」，這種「我生不辱命在天」的落伍思想應該放棄，須知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歷史使命決不會落到專制獨裁方面，「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滿清和北洋軍閥可以借鑑。

總之凡是中國人萬萬不可存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思想，從這種思想發生的言論，一定引起日本法西斯通訊機關同盟社發出這樣的聲明：「蔣介石所著『中國之命運』一書內，論述之方向那

是沒有錯誤的，但由日本人觀之，它只是重複了已爲帝國聲明說盡了的大東亞新秩序論，來迎合大亞細亞主義以及汪精衛之和平建國論」。天乎冤哉！一個堂堂中國國民黨總裁抗日六年的領袖，反法西斯同盟兩大強國的領袖之一，所著的一本自認爲「革命」到了頂點的書，却被我們的敵人譽爲「方向」，沒有錯的方向，但不過是重複「帝國聲明」與「抄襲汪精衛」，即使作者不害羞國民黨人不知恥，中國人民是不能饒恕日本帝國主義這種侮辱的。中國人民有責任糾正自己隊伍中個別人們與個別集團的思想錯誤及行動錯誤，澈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我們共產黨人告訴日本帝國主義者，我們的「方向」就是打倒你們，解放我們的民族，同時也解放日本人民，糾正我們民族中的一切缺陷，錯誤，污穢，同時就糾正日本帝國主義的「方向」，中日兩國同時解放萬歲！

感言

續範亭

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先生，最近發表了一篇「中國之命運」，我想凡是一個中國人都必然很關心很注意這篇東西，因為中國之命運就是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同胞大家的命運，就是或生或死或存或亡或榮或辱的前途，如何能不關心不研究不批評呢！就是不識字的同胞們，也應該問一問：蔣介石先生說的些什麼話？辦的些什麼事？如果你以為這是蔣委員長寫的，不用研究，不用批評，絕對沒有錯誤，盲目的接受，那你就不是革命者，不是國民黨員，更不是共產黨員，不是進步人士，不是中國的國民，那你就會沒有腦筋的只知順從的奴才，走狗。因此，我也要談談中國之命運。

當我看到蔣介石先生「中國之命運」的預告時，也是恨不得以先睹為快，及我既看到「中國之命運」時，覺得他抗戰六年不但毫無進步，而且變本加厲，使我對蔣先生的一點幻想也完全打消了。嗚呼！此亡國之論胡為乎來哉！其中細節，已由陳伯達、范文瀾、呂振羽、齊燕銘、何思敬、艾思奇諸先生批評甚詳，可謂真矣！可謂誠矣！我的話比較粗魯些，但也是赤條條的，我所

看到感到的就是這本毒液頭澈尾都是反革命反三民主義的言論，綜合起來，就是「法西斯主義中國化」。蔣先生決心要把中國引到黑暗的深淵裏去，而法西斯奴才們正以此灌輸我們的青年，毒害我們的青年，全國同胞你們看可怕不可怕？

看了「中國之命運」之主要內容：一方面主張完全保留中國封建制度、政治、經濟、文化，用不着再來革命；一方面反對共產主義，反對民主，與同盟國政策路線完全相反。前者是反對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後者是助長法西斯蒂的獨裁主義。試問舊的中國如果是好的爲什麼百年來挨打挨得落花流水，幾至亡國？孫中山先生又何必革命？如果說法西斯獨裁是好的，同盟國爲什麼決心要消滅他？共產黨如果是不好的，同盟國爲什麼又和他好，幫助他，讚揚他？

蔣先生最標榜的是一個「誠」字，但誠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希魔、墨魔、日魔他們對於法西斯主義有決心，有恆心，可謂有誠心。中國有句舊話說：「假君子鬥不了真小人」，以十分的精神力做壞事，就是真小人，真小人有了組織就很厲害，但是今天他們所遇到的不是假君子，是以蘇聯爲基幹的同盟國統一戰線，真小人遇上君子，他就非失敗不可。中國的事也是如此，不能例外的。

他這一篇東西完全是反革命的中國式的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中國化也。試想世界大戰結束後，尚能容許法西斯主義存在嗎？這完全是違反中國人民意志，違反世界潮流，蔣介石自己主

觀的命運，而不是中國之命運。

中國之命運究竟何在呢？中國之命運就在於抗戰勝利，協同盟國消滅法西斯，建立三民主義的新中國。毛澤東先生的「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諸種論文，那就是中國的真正命運，再不能有其他命運。因為這些論文都是合乎客觀真理的唯物的革命的，而不是個人幻想的唯心的反革命的「中國之命運」。

當袁世凱想做皇帝的時候，是以他個人的命運來決定中國之命運，說他的八字好，正合乎做皇帝的資格。皇帝是做了，可惜沒有算準時間，兩個月後就吐血而亡。

吳佩孚也常常請人扶規算卦批八字，說他可以統一中國，想拿個人命運來決定中國命運，可惜也沒有算得準確，十四年就讓國民軍打得落花流水，十七年北伐，摧毀了他的全部基礎，現在他也死了。今日蔣先生提出「中國之命運」，名詞上似乎比他們高一着了，然而觀其內容，也完全是以唯心論，主觀主義，自私自利獨裁夢想的個人英雄主義來決定中國之命運的，而其中又有許多話都是和日本法西斯軍閥的目的相同的。全國同胞們！我們要萬分警惕呀，這是製造內戰的準備工作！

中國的推命家都是從個人命運出發來決定國家大事，這是完全唯心的，真要推斷國家之命運，必須先推斷世界命運，中國是世界一部份，不能遺世而獨立。毛澤東先生說：「大道理管小

道理」這是非常正確的。沒有世界眼光，妄自尊大，以個人野心夢想來推斷中國之命運，那都是夢話，都是妄想，必然走了死路。

我們推斷現在的世界命運是走紅運的，向光明一方面發展，而不是走黑運的，向黑暗一方面發展。法西斯主義就要死亡，革命的力量正在發展，中國是同盟國的一員，中國命運也必然是向着光明的方面發展，而蔣先生偏偏向着黑暗的一方面。現在盒蓋已經揭開了，明明是白的，你怎麼硬說是黑的，非獨裁不可？除了法西斯第五縱隊這樣講，還有誰肯這樣講？由此證明中國國民黨法西斯化不只一日了，今天才完全揭露出來。法西斯奴才們，用抽樑換柱的方法，把國民黨盜竊去了，古人有竊國竊鉤之喻，今日竟有竊黨而兼竊國者，當得何罪！！

一九三五年我在陵園剖腹後，答各友人信中說：「中國如果法西斯實現了，我們不但有殺頭之禍，而且有閹割之虞。」那時候只站在人道主義的立場上來反對法西斯。一九四〇年我答友人信中，也給法西斯命運推算了一卦，卦中有三十四個字的結論：「日暮途窮，倒行逆施，沒落階級，勢必至此。勉強掙扎，不足救死，前途如何，一段醜史而已。」

今天國民黨的反動派如果還不覺悟，遵照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發展下去，那麼他們的前途也必然是如此，是自我死路的。而真正的中國之命運却是勝利的，光明的，民主自由獨立平等的。爲什麼？因爲有了共產黨的保障，中國的勞苦羣衆，先進人士的保障，毛澤東政策路線之保

障。

就以蔣介石本身說，國民黨本身說，也並不是日暮途窮，並且只要他們不倒行逆施，只要他們肯向前進，不要倒退，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是他們自私自利的近視眼看的既不遠走的又不是正道，所以總覺得前途沒路了。於是乎倒行逆施，提倡舊禮教，羨慕舊制度，傳法西斯衣鉢，集封建之大成，北洋軍閥餘孽氣死孫中山的段祺瑞老狗，上海大流氓屠殺工農革命羣衆的黃金榮等，蔣介石都早拜爲老師，對段祺瑞死後主張國葬，對黃金榮則推崇爲當代聖人，爲他建立德政碑，創修花園馬路；又復任用官僚政客楊永泰，賣國外交家黃郛等一班壞人，綜合中國軍閥，官僚，流氓，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還有那托派餘孽於一爐而熔之，變成了中國式法西斯的龐大的組織。這些走狗們散佈全國，尤其是八路軍新四軍範圍內，挑撥離間，造謠惑衆，反對進步，破壞團結，叛國通敵，無所不爲，攜帶了毒藥手槍短刀，實行暗害、謀殺、活埋、盜竊等等無恥手段，詭詐殘酷，無以復加，就我自己的周圍，已經發現了五六個特務，差不多都是與日本特務汪逆特務有連系的，他們簡直成了一家了。但是他們都是中國人，都是中華兒女，都還有些良心，他們看見邊區的一切都是爲國爲民的，堅決抗日的，於是他們良心發現了，自己說出來，不忍完全遵照特務們的指示害人害國，有的說把手槍交了公家了，有的說毒藥短刀扔掉了，我雖沒有被他們害死，但是前一月把我保存的整風文件十八本，被他們盜走了，最

初我非常生氣，後來想盜去了亦好，送到他們指揮機關去，讓他們好好看一看，把他們的歪風、壞風、惡風、妖風也來整一整，或者也有一點好處。現在國民黨區域，真乃是特務橫行，民不聊生，抗日軍隊，消極怠工，文武官吏，上下其心，人民認識，模糊不清，敵人乘間，引誘投誠，進退維谷，搖擺不定，你看他們把國家弄成個什麼世界了？他們的行為下流無恥到什麼程度了？還正在那兒執迷不悟哩！

當我在民國二十四年總理陵前自殺的前幾月，國民黨開代表大會，我雖沒有參加會議，但是會議的內容我也知道許多，選舉委員時，指定、圈定、包辦、賄買，比曹錕賄選總統時代花樣更多。那時黑暗形態的反映，我還記得有四句詩是其中一個代表寫的，傳遍了全會場及南京、上海等地，那四句詩是：

「一身豬狗熊，兩眼官勢錢，三訣吹拍騙。四維禮義廉。」

這四句詩是了解具體情況的人把他們的典型人物描畫出來了，「豬狗熊」是不像人樣子，「官勢錢」是官僚、軍閥、資本家，「吹拍騙」是吹牛、拍馬、騙人，「禮義廉」是無恥，提倡新生活的多少年依然還是如此無恥。這又怨着誰，難道是共產黨迫你們幹的嗎？一切罪惡行為都是由於獨裁夢想演成的吧？當時我真悲觀失望憤懣極了，感到偌大中國四萬萬人民被這些無恥的東西斷送了真太冤枉，於是有陵園剖腹之事，鼓起了我的大無畏精神，流了我的滿腔熱血，才把他們罵

了一頓。但是你們的特務份子們說我是「失戀了」，不錯我誠然是失戀了，我熱愛的國民黨，當他十三歲的時候，交了共產黨做朋友，替他打扮了打扮，也覺得相當漂亮，還有出息，但是他到了十六七歲就變節了，被人引誘改嫁了，現在他已三十二歲，應該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然而因為他十餘年的自毀形體，已經不成樣子，我也早不愛他了。又說我是「得神經病了」，不錯是有神經病，但我的痛是被你們喪心病迫成的，當時全國愛國人士全國青年奔走呼號、開會、請願、反而挨打、殺頭、囚禁、活埋，舉國若狂，那都是神經病，不過他們的病，你們的喪心病不同，主要他們都是愛國病。嗚呼！自從你們掌握政權以來，除了你們少數奴才走狗享樂舒服以外，試問那一個中國人神經不受刺激，不傷腦筋？你們的獨裁政治特務政策，把中國人民欺負壞了，摧殘極了。六七年來，蔣委員長走入抗戰，雖然是勉強的，我們對於這一點却是確實擁護，並且以忠厚之心不念舊惡，相忍爲國，希望你们在抗日過程中，由於事實的教訓，或者能有所改進，誰能想到我們這一點點最後的希望竟然落空？「中國之命運」竟公然宣佈封建獨裁，實行法西斯的勾當了。對於抗戰消極怠工，對於邊區槍口照準，對於人民不願死生，妄談什麼「誠」？什麼「公」？我們都早知道了，你們對於開倒車是早已有決心，有恆心了，這就是所謂「誠」；對於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不給一槍一彈一錢，要他們抗戰，挨餓、受苦，犧牲，最後還要要他們的命，殺他們的頭，這就是你們所謂之「公」。我曾說：「大資產階級要佔大便宜，小資產階

級要佔小便宜，封建階級要佔者便宜，無產階級就求不吃虧，絕不向人要便宜」。你們把便宜佔盡了，還不甘心滿意麼？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曾向重慶來的聯絡參謀說過：「請告重慶當局，古人說『有奶便是娘』，今日無奶也是娘，不給吃，不給穿，不給槍彈，也是要服從抗戰到底的。」這還不夠便宜麼？爲什麼還要一定把人置之死地？實在告訴你們吧，現在大奸賣國的秦檜雖有，再不會有多少愚忠誤國的岳武穆了。

你們的特務政策沒有成功，一方面只是無法無天得罪了人民；一方面是自私自利，又被日寇汪逆利用了。前月鄧寶珊將軍過延安相隨了一位駐榆林的大公報記者楊令德。他問我：「續先生既是國民黨員，爲什麼駐在延安？」我說：「我孤立多年了，因爲不願加入一個小圈作奴才；所以寧願孤立。古人說『寧爲雞頭，勿爲牛後』，今天是寧爲牛後，不做狗頭，請你把這話告訴重慶的朋友們吧！」實際上他們爲法西斯當奴才，也做不了個狗頭，也不過是狗腿、狗尾、狗毛而已，法西斯制度一定死亡，他們不過落一個死狗腿、死狗尾、死狗毛而已，歷史也就夠醜了。

我這篇謔言，在奴才們看來，一定說我是大逆不道；在動搖份子看來，一定說我是言之過甚，然而在革命的人看來，還須說我是忠實無比呢！我覺得世界上除真理以外，再沒有任何威權可以使我屈服；一九三五年我在西湖養傷時，曾作過一首抗日的詩：「不怕死，不怕疼，不怕辛苦不怕窮，養成一片大無畏，誓與倭寇決雌雄」。在西安事變蔣先生被釋放回南京後，我曾寫了

幾篇文章，其中有：「我是一個國民黨員，但我沒有受過南京政府的洗禮，吾人生當共和民主之世，而受專制流毒之苦，推其原因，皆因蔣先生獨裁一念有以致之。」不當奴才，須是任何人的奴才也不當，如果這些特務份子奴才們說：「我是願意當蔣先生的奴才，而絕不當日本奴才。」這都是騙人的話，因為基本上奴才的本質是相同的，主要他們是又怕死，又怕疼，又怕辛苦又怕窮。不管國內國外的統治者，不外兩個法寶：一個是威脅，一個是利誘，這就使這些奴才們一方面做國民黨特務，一方面又做日本汪逆特務，這還有什麼奇怪呢？

如果沒有奴才們為基礎，就無法實現其獨裁，在時勢造英雄一方面說來，實在也不能把一切錯過都推在蔣先生身上，但是在英雄造時勢的一方面說來，蔣先生要完全負責的。因為沒有獨裁就沒有這麼多的奴才。如果蔣先生沒有獨裁的迷夢，走上三民主義的民主道路，這些奴才們也會因人民的民主力量一步一步教育好了，但是蔣先生不知道民主力量的偉大，所以始終認為「個人權威可以決定一切」，才走上今日之道路，才有「中國之命運」之發表，這也是思想方法之錯誤養成的。所以我覺得整風要把全國整一下才有辦法，今天我們批評、糾正、反對蔣介石之「中國之命運」，就是用民主力量來整風的工作。

全中國的同胞們！孫中山的真正信徒！大家起來吧，根據三民主義批評、糾正、反對這個「中國之命運」的錯誤思想是必要的，拯救蔣先生，拯救那些奴才們，拯救中國，拯救世界是何

等急切偉大的事呢！日寇是洪水，凡是中國，都要同舟共濟的，船到中流風高浪大，我們在船上的人同時都要下手努力加油，一篙也緩不得，危險了，失去了重心了，大家都要脫鞋子下水，脫得赤條條下水來拯救這隻危船，有三民主義的指南針，有民主主義的舵手毛澤東先生，我們一定能戰勝日寇，建立新中國，到達彼岸。中華民國是亡不了的，勝利全在我們的努力。

（完）

論中國之命運

著者：艾思奇等

出版者：曉光社

經售者：各大書局

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初版

實價國幣

422 1

曉

▲
1000